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

# 名家传记 学生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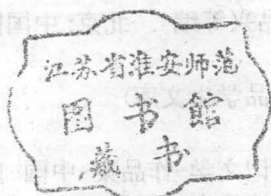
● 张品兴 夏小飞 李成忠 编  
●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

000667950

122856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张品兴 夏小飞 李成忠编

# 名家传记学生读本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

I25 / 826

责任编辑: 吕佩浩  
装帧设计: 李士英  
责任校对: 徐守峰  
版式设计: 小 峰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名家传记学生读本/张品兴等编. -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1996. 8

(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)

ISBN7-5078-1316-9

I. 名... II. 张... III. 传记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 I2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3304 号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

名家传记学生读本

张品兴 夏小飞 李成忠 编

---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 100866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久恒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激光照排

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 × 1168 32 开本 6.75 印张 160 千字

1996 年 8 月 第 1 版 1996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 3000 册

ISBN 7-5078-1316-9/I·68 定价: 9.50 元

## 编者的话

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》是为广大中学生选编的课外文学读本，选取的是适合青年阅读的名家之作。

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名人辈出的时代。发生在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，其规模之大，影响之广，涌现名人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进入现代领域的契机。在“五四”以后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的一个个新学科建立起来了。中国的思想界、学术界和文化界开始接近世界，中华文化开始溶入世界文化的主流。随着新学科的建立，一批学科奠基人诞生了。在一定意义上，他们是文化巨人，具有广博的知识和通晓中西文化的特点。

二十世纪的中华文化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——汉语言文字的大转变，即汉语从脱离口语的文言文转变为与口语相一致的白话

文。这是中国语文的一次飞跃。这一飞跃又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，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。一代文人以自己的创作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，写下了一批传世佳作。正是这些名人佳作战胜了老朽僵化的文言文，成为白话文写作的范本。这些名人佳作，形式活泼，语言清新，闪烁着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光辉。阅读这些自然优美、气度非凡的文字，我们可以体味人生，陶冶情操，锤炼文笔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。

名人佳作往往具有思想的开拓性。名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常常与凡人不同，他们的眼光敏锐而深邃，是新思想的创造者。新思想是名人思维的产物。名人佳作又几乎是知识的海洋，在她的金色沙滩上，闪光的珍珠俯拾皆是。这是那些显赫一时的浅薄之作无法比拟的。名人佳作中还洋溢着人类高尚的情操，阅读它们能使我们心地更善良，更纯洁，还能唤起我们的良知，向社会丑恶现象作斗争。

名人是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。那些在历史舞台上显赫一时而又像昙花一现很快消失的人物，是不应该列入名人之列的。名人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他们是人们效法的榜样，追求的目标。在极左思潮横行时期对所谓“名利思想”的批判曾经淹没了不少名人，使他们无法脱颖而出。其实，中国是需要大批名人的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编者了却了多年的愿望，编辑了这套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》，将名人佳作介绍给中学生朋友。

英国哲学家、作家培根曾经说过：“知识像烛光，能照亮一个人，也能照亮无数后人。”中学时代，是长身体、求知识、立大志的重要阶段。我们愿这套小丛书，像一束金色的烛光，陪伴着青年朋友扬起理想的风帆，走向成功的彼岸。

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继往开来，群星灿烂的时代。让我们高举双手，迎接这一新时代的到来吧！

# 目

# 录

## 上编·名人自传

蔡元培

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(3)

盖叫天

我为什么叫盖叫天(12)

林语堂

在学校的生活(17)

郁达夫

我的梦,我的青春!(23)

宗白华

我和诗(29)

朱自清

我是扬州人(37)

冰 心

我到了北京(42)

梁实秋

清华园生活点滴(48)

巴 金

家庭的环境(54)

丁 玲

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(68)

钱君匋

我和书法的因缘(73)

艾 青

我曾经喜欢……(86)

侯仁之

我爱旅行(90)

孙 犁

青春余梦(95)

温济泽

我的人生起点(99)

流沙河

这家伙——流沙河自白(109)

贾平凹

我的小传(113)

## 下编·怀念名人

艾 青

忆白石老人(117)

丰子恺

怀李叔同先生(125)

梁实秋

胡适先生二三事(133)

- 老 舍  
敬悼许地山先生(139)
- 宗 璞  
三松堂断忆(146)
- 胡 适  
追悼志摩(153)
- 茅 盾  
回忆秋白烈士(162)
- 夏 衍  
忆阿英同志(168)
- 丁 玲  
也频之死(175)
- 黄永玉  
往事和散宜生诗集(183)
- 光未然  
回忆冼星海同志(193)
- 魏 巍  
才子·战士·学者——怀念  
邓拓同志(200)
- 编后语(207)

上编

名人自传



## 蔡元培(1868—1940)

社会活动家、教育家。原名蔡阿培,后改子民。浙江绍兴人。清光绪进士,翰林院编修。1902年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,并创办爱国学社、爱国女校。1905年参加同盟会,从事革命斗争。1907年赴德国留学,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、美学、文学。辛亥革命后回国,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。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27年后为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、中央研究院院长。九一八事变后,与宋庆龄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,任副主席。抗战爆发后,积极主张抗日。1939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。有《蔡元培全集》行世。

###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

北京大学的名称,是从民国元年起的;民元以前,名为京师大学堂;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,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;我在民元前六年,曾任译学馆教员,讲授国文及西洋史,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。

民国元年,我长教育部,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:一、大学设法商等科的,必设文科;设医农工等科的,必设理科。二、大学应设大学院(即今研究院)为教授、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。三、暂定国立大学五所,于北京大学外,再筹办大学

各一所于南京、汉口、四川、广州等处。（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。）四、因各省的高等学堂，本仿日本制，为大学预备科，但程度不齐，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，乃废止高等学堂，于大学中设预科。（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，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，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，文化不免落后；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，就不必顾虑了。）

是年，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；两年后，严君辞职，改任马相伯君，不久，马君又辞，改任何锡侯君，不久又辞，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。民国五年冬，我在法国，接教育部电，促回国，任北大校长。我回来，初到上海，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，说北大太腐败，进去了，若不能整顿，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，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。但也有友人说，既然知道它腐败，更应进去整顿，就是失败，也算尽了心；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。我到底服从后说，进北京。

我到京后，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，问北大情形。他说：“文科预科的情形，可问沈尹默君；理工科的情形，可问夏浮筠君。”汤君又说：“文科学长如未定，可请陈仲甫君；陈君现改名独秀，主编《新青年》杂志，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。”因取《新青年》十余本示我。我对于陈君，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，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《警钟日报》服务时，刘君语我：“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，发起的若干人，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，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。”现在听汤君的话，又翻阅了《新青年》，决意聘他。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，我即往访，与之订定；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，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，沈君亦原任教授，一仍旧贯；及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，次第执行。

我们第一要改革的，是学生的观念。我在译学馆的时候，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。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，只

要年限满后，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。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，把第一次的讲义，照样印出来，按期分散给学生，在讲坛上读一遍，学生觉得没有趣味，或瞌睡，或看看杂书，下课时，把讲义带回去，堆在书架上。等到学期、学年或毕业的考试，教员认真的，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，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，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。要是教员通融一点，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，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；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，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。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，得了一种保障了。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，是从京师大学堂“老爷”式学生嬗继下来（初办时所收学生，都是京官，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，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）。他们的目的，不只在毕业，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。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，他们不见得欢迎；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，考试时严格一点，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，虽罢课也所不惜。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，来兼课，虽时时请假，他们还是欢迎得很；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。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，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。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，就说明“大学学生，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”。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，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。

那时候因《新青年》上文学革命的鼓吹，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，他回国后，即请到北大任教授。胡君真是“旧学邃密”而且“新知深沉”的一个人，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、兼士兄弟，钱玄同，马幼渔，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，一方面整理英文系；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，颇不少。

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，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；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，即使主张不同，若都是“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”的，就

让他们并存，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。最明白的，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，而刘申叔、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；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。我信为应用起见，白话文必要盛行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，也替白话文鼓吹；然而我也声明：作美术文，用白话也好，用文言也好。例如我们写字，为应用起见，自然要写行楷，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，当然不可；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，作装饰品，即写篆隶章草，有何不可？

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，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，学问未必都好，而来校既久，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，也跟了阑珊起来。我们斟酌了一番，辞退几人，都按著合同上的条件办的。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；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，我不答应。朱尔典出去后，说：“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”，我也一笑置之。

我从前在教育部时，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，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；不意北大的预科，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，竟演成独立的状态。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，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；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；毕业后若直升本科，发生困难。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，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。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，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，不再设预科学长。预科中主要的教课，均由本科教员兼任。

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，常为之通盘打算，求其合理化。是时北大设文、理、工、法、商五科，而北洋大学亦有工、法两科；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，都是国立的。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，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，而北洋之法科，刻期停办。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，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

了。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，用在理科上。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，专授法律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，毫无设备，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，于是并入法科，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。

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，以为文、理两科，是农、工、医、药、法、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，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，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。所以文理两科，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；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，兼任教员，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。所以完全的大学，当然各科并设，有互相关联的便利。若无此能力，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，名为本科，而其他应用各科，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，如德法等国的成例。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。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，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，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，而编为本科大学；然没有达到目的。

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，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。例如文科的哲学，必植基于自然科学；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，亦往往牵涉哲学。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，而现在用实验法，应列入理科；教育学与美学，也渐用实验法，有同一趋势。地理学的人文方面，应属文科，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。历史学自有史以来，属文科，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，则属于理科。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，废学长，设系主任。

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。清代教育宗旨有“尊孔”一款，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。到北大后，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，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；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。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，贻我一函，属约梁任公、章太炎、林琴南诸君品题；我为分别发函后，林君复函，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，我

复一函，与他辩；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，所以抄在下面；（略）。

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，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，是无可疑了。越四十余日，而有五四运动。我对于学生运动，素有一种成见，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，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，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。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，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，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，不必牵涉学校。所以民国七年夏间，北京各校学生，曾为外交问题，结队游行，向总统府请愿；当北大学生出发时，我曾力阻他们，他们一定要参与；我因此引咎辞职。经慰留而罢。到（民国）八年五月四日，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、陆、章的主张，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，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。他们因愤激的缘故，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，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，各校皆有，而北大学生居多数；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，始释放。但被拘的虽已保释，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，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。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，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，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，不可以不速去。乃一面呈政府，引咎辞职，一面秘密出京，时为五月九日。

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，政府逐队逮捕，因人数太多，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。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，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，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，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。政府知势不可侮，乃释放被逮诸生，决定不签和约，罢免曹、陆、章，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。

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，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，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，又起了多少纠纷。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，

而为学生所反对，不能到校；各方面都要我复职。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；不但为校务的困难，实因校务以外，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，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，所以启事上有“杀君马者道旁儿；民亦劳止，汽可小休；我欲小休矣”等语。但是隔了几个月，校中的纠纷，仍在非我回校，不能解决的状态中，我不得已，乃允回校。回校以前，先发表一文，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，告以学生救国，重在专研学术，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（全文见《蔡子民先生言行录》下册 337 至 341 页）。到校后，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，说明德国大学学长、校长均每年一换，由教授会公举；校长且由神学、医学、法学、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；从未生过纠纷，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。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，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（全文见《言行录》341 至 344 页）。

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，请他通盘计划，设立教务总务两处；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，均以教授为委员。请蒋君任总务长，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。

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，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，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，声应气求，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，所以兴会较高一点。预定的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文学、国学四种研究所，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。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，比较的困难一点。自民国九年起，自然科学诸系，请到了丁巽甫、颜任光、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，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；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、陈聘丞、丁庶为诸君，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、石衡青诸君。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，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，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。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，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，切实用功；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，使合于讲演之用。在社会科学方面，请到王雪